

现代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丛书 主编 程恩富 马艳 冯金华

价值转形理论研究

严金强 马艳 著

$$l(v + \Delta v + \frac{m}{x}) = ll(c + \Delta c)$$

$$Y = \beta_0 + \beta_1 X_1 + \dots + \beta_n X_n + \varepsilon$$

$$l(v + \Delta v + \frac{m}{x}) = ll(c + \Delta c)$$

$$= \beta_0 + \beta_1 X_1 + \dots + \beta_n X_n + \varepsilon$$

$$l(v + \Delta v + \frac{m}{x}) = ll(c + \Delta c)$$

$$Y = \beta_0 + \beta_1 X_1 + \dots + \beta_n X_n + \varepsilon$$

$$l(v + \Delta v + \frac{m}{x}) = ll(c + \Delta c)$$

$$Y = \beta_0 + \beta_1 X_1 + \dots + \beta_n X_n + \varepsilon$$



东
华
大
学
出
版
社

现代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研究系列丛书
上海财经大学“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价值转形理论研究

严金强 马 艳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价值转形理论研究/严金强,马艳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1.12

(现代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研究系列丛书)

ISBN 978-7-5642-1294-0/F·1294

I. ①价… II. ①严…②马… III. ①价值转移-理论研究

IV. ①F0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5979 号

- ☐ 责任编辑 张小忠
- ☐ 封面设计 钱宇辰
- ☐ 责任校对 王从远 胡 芸

JIAZHI ZHUANXING LILUN YANJIU

价值转形理论研究

严金强 马 艳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竟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890mm×1240mm 1/32 8.125 印张 233 千字

定价:30.00 元

内容提要

本书使用数理分析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价值转形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

这一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为基础,通过系统梳理转形问题争论的历史文献,同时结合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围绕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四大假定条件,分别构建静态价值转形模型、狭义动态价值转形模型和广义动态价值转形模型,试图突破原有的研究框架,从新的视角为转形问题的解决和转形理论的运用提供理论支持。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转形理论回顾和溯源、转形理论分析和创新、转形理论意义及应用三部分。

丛书总序

程恩富 马 艳

重视数学分析,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定量分析,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优良传统之一。《资本论》就是一个典范。可以说,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运用数学最多的就是马克思。“马克思使用的计算,主要是用作文字论证的补充说明,他的文字论证将过程和横断面分析结合在一起了,这样的计算即使对今天现有的数学技巧来说,也是做不到的。”^①马克思自己曾说:“为了分析危机,我不止一次地想计算出这些作为有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而且现在我还认为,如有足够的经过检验的材料,这是可能的)。”^②马克思重视数学方法在经济研究中的作用,但并不迷信数学,而是始终将数学方法建立在正确的分析前提上,即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坚持以科学抽象法、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作为分析的基础。此外,马克思还认为,在纯数学领域内进行的研究,必须通过经济分析进行检查,使它不脱离某一经济现象所固有的经济规律。由于坚持了上述原则,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的数学化分析能够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和科学性。

相比之下,现代西方经济学虽然运用了大量的数学工具,但由于其出发点时常失误或脱离现实,因而其数学化的结果并不能表明其理论的科学性和精确性。例如,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联立方程组中,通常必有一个方程是按总供给与总需求

① 肯尼思·梅(K. May):《价值和价格:对温德尼茨解法的一个注释》,载《经济杂志》1948年第6期,第5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相均衡的原则设立的,从而这样的数学模型求解出来的结果,必定与生产过剩等常见实情相距甚远,从而无法发现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也无法预测经济危机。另外,数学模型的复杂性并不与数学模型的科学性成正比。比如,西方宏观经济学模型为了体现自己的科学程度,喜欢搞上百个方程和上百个变量的过于复杂的大型模型,却忽略了每个变量都存在计量误差,随着方程数和变量数的增加,每个变量些许误差的集合会放大成巨大的误差,从而使得模型只有纸面上的意义,难以科学认知和应用。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经济学对于数学工具的运用是不充分的。马克思曾经讽刺李嘉图,“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是他所知道的惟一的社会形式。”^①与此类似,“令所谓的利润函数一阶导数等于零是西方经济学家所知道的惟一的求解利润最大化的方法”。^②但是,一方面,这一方法并不总是求解利润最大化的方法,另一方面,考虑到风险的存在,资本家也并不处处追逐短期利润的最大化。显然,不受西方经济学束缚的政治经济学可以更为合理地使用更多的数学方法。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海派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团队编写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100万字完整版、60万字通用版和30万字简明版)、《中级现代政治经济学》(100万字完整版、60万字通用版)、《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100万字完整版、60万字通用版)等,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套“现代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研究系列丛书”,都表明了政治经济学数学化的良好发展前景和我们团队为此所作出的探索与耕耘。

现代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研究系列丛书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在坚持思想内容创新的基础上,使用数理分析方法和计量方法对当下学术界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国内外热点经济问题进行论证、阐述和发展的一个有益尝试。

这种尝试主要沿着如下三个层面和基本路径进行: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脚注。

② 余斌:《经济学的童话》,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第一个层面是内容创新。所谓内容创新,就是提出一些新理论或新观点,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或新的理论体系的过程。这一研究过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本系列丛书就是将内容创新和思想创新放置在首要的位置,无论是在基础理论方面,诸如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和价值转形理论,失业理论和地租理论等理论,还是现实经济问题,诸如国际交换和国际贸易问题,房地产和虚拟资本市场问题,网络经济、信息与传媒经济问题,能源、环境与低碳经济等问题,都有从理论体系框架到基本思想和观点多个方面的内容创新。

然而,创新的理论内容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经济学界经常使用的表达方法无非是文字分析和数理分析。文字分析方法就是用文字符号来描述经济现象,通过上下文的语句逻辑进行推理的一种方法,这种分析方法比较适合理论内容创新过程中的定性分析和研究,更高级的理论抽象与表达则是数理分析的长处。

第二个层面是数理分析。所谓数理分析,是指利用数学符号以及几何学、矩阵代数、微积分、微分方程、差分方程等数学工具来描述经济问题,运用已知的数学定理通过推理过程得出一组结论或定理的一种经济学方法^①。

这种分析方法对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一方面会使得一些新思想新观点的表达更加简洁,可以将很复杂的语言内容抽象成为几个公式或几条曲线,一方面可以使一些新思想、新命题通过“如果—那么”的严格假设条件推理后更加严谨,更加精确。

为此,本系列丛书广泛地使用了现代数学工具,并针对不同的问题使用了不同的数学方法。诸如运用了导数、对数、函数对价值理论以及结构性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等进行分析,在剩余价值等理论中还使用了最优化方法,运用矩阵代数的处理方法对价值转形

① 蒋中一:《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6 页。

理论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利用了矩阵代数中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等推理出来的结论具有重要价值;在剩余价值生产动态分析、动态价值转形模型、平均利润规律动态模型、两部类经济增长关系模型中则使用差分方程分析了跨期之间的变量关系等。

第三个层面是实证分析。所谓实证分析,主要是利用计量分析技术,诸如运用估计和假设检验的统计学方法进行经验观测的分析方法。^①这一分析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过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任何理论的创新都必须从现实经济活动中出发,是基于对现有经验数据和历史材料的整理分析和抽象才能得出的结论或命题,反过来,任何一种新的理论也必须运用经验数据对其有效性进行检验并经现实经济活动实践后才具有可运用性或证明其科学性。

为此,本系列丛书在剩余价值理论模型的劳资关系实证分析过程中使用了问卷调查方法,在网络经济虚拟性的实证分析过程中使用了案例分析方法,在平均利润率的动态模型中的实证分析、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实证分析、两部类经济增长关系模型实证分析过程中使用了最小二乘估计(OLS)回归方法、协整检验、平稳性检验等计量方法,在地租和房地产经济理论以及国际不平等交换等理论分析中使用了面板数据(Panel Data)回归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Test)、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等计量方法。

然而,本系列丛书沿着上述基本路径所进行的三个层面的理论创新并不是相互割裂或片面倾斜,而是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和理论逻辑的。

首先,本系列丛书遵循了内容创新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前提的原则。

思想内容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的首要任务,也是数理分析和计量分析的前提条件。本系列丛书虽然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过程中,大量使用现代数学的

① 蒋中一:《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页。

最新成果来表述与分析、演绎与推理其理论框架(数理模型),力图在数学逻辑的明晰假设基础上进行理论传承与创新,这是由于“恰当地运用数学方法,可以使正确的理论和科学的研究成果表达更为准确和精确,可以更好地检验结论和前提是否一致或矛盾,可以更有力度地增强研究成果中的结论”,^①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就数理分析本身而论是不能创造任何经济思想,也不能创造任何经济学概念、理论和体系的,因为“数学形式的正确,决不能证明经济理论的正确”,而创新理论内容正确则是数理分析的前提条件。吴易风教授曾生动地描述道:“在数学这个磨盘中,你放进小麦,可以磨出面粉;你放进草籽,就决不会磨出同样的东西。计算机科学家的‘废料进,废料出’的说法,生动地表明,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不管用了多少数学和多么复杂的数学,都不可能得出正确地结论。”^②

可见,对政治经济学的数理分析可以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为总的方法论原则,同时高度重视利用数学分析工具,把数学分析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前提假设和理论基础结合起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论证、阐述和发展,以弥补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的不足。这里所说的数学化,并非数学化程度越深越好,而是要依据理论内容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正确性为前提。第二种则是盲目地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接轨,注重数学分析的形式主义和滥用数学工具。为了数学而分析,而不是为了分析而运用数学,甚至为了便于参照西方经济学的方式运用数学,而采用西方经济学所使用的部分错误假设和前提,背离了在政治经济学里运用数学的初衷,得出了许多错误的结论。前一种态度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攻方向之一,后一种态度则是需要避免的。本系列丛书在使用数理分析方法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即十分注重所研究的理论创新内容是否正确,“有没有陷入无用数学符号迷阵,有没有忽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

① 吴易风:《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② 同①。

互依存性”，^①也就是非常注重所创新的内容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逻辑的问题。

其次，本系列丛书坚守数理分析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必要手段和工具的原则。

这是因为就技术性来看：（1）数理分析方法所使用的数学语言与文字语言相比更便于理论演绎推理，其表达也较为简练。（2）数理分析方法可以戒除文字逻辑存在的假设不明晰的缺陷。（3）数理分析方法可以用数学定理来证明其推理的正确性。从这个方面讲，我们也同意康德的“数学是人类理性的骄傲”的命题，对此，马克思也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用逻辑的和历史的演绎方法推理得出科学的结论构成的理论体系，所以从逻辑上讲马克思的推理方法和“公理化”的数学方法是一致的，而且这种推理方法也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严密性。（4）数理分析方法通过数理逻辑分析将一些创新内容表达出来后所建立起来的数理模型也为计量工具的使用和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使得内容创新与实证分析之间有了一座桥梁。

就现代性来看，数理分析方法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一是可以运用现代数学的最新成果，为逻辑分析、抽象分析和定性分析等方法提供支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更全面的阐述；二是可以运用数学工具，对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材料进行更科学的归纳、整理和分析，并为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决策提供更为详实的依据；三是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对现代市场现象进行数学解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的对比，从而增强人们的理论辨别力；四是可以使理论更严谨和清晰，易于表达，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解释力和说服力。总之，数理分析方法将有利于弥补目前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部分缺憾，大大促进其理论的传承和创新，真正

① 吴易风：《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② 保尔·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3页。

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征。

同时,本系列丛书也十分注意所要使用的数理方法是否必要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力图坚守只有在使用数学方法比不使用数学方法更利于阐述和分析问题时才使用,^①而不是相反的原则。本系列丛书还坚持只有在所涉及的变量可量化、数据可以得到的情况下才使用数学方法,^②因为如果变量不可以量化,那么用数学方法考察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比用文字分析好,甚至更差,这种情况就不适于用数学方法,另外,如果数据得不到,即使用数学方法得出了某些结论,也无法检验和预测,那么使用数学方法就得不到额外的好处。此外,本系列丛书坚持使用公理化的逻辑推理,表现为许多理论模型是建立在公理化的逻辑推理和演绎基础上的,并通过“公理(或假设)、推理、结论、检验”这一过程保证其理论逻辑的严密性。

最后,本系列丛书坚持实证分析方法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过程中起到进一步验证理论以及更好地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用的原则。

实际上,无论是内容创新和数理分析都属于理论分析,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则是相辅相成和相互作用的,这一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过程的体现。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任务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推理演绎这一层面的创新上,而是要有效地指导社会实践活动,所以,历史性与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特征。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就是一门实践的历史科学,所以,实证分析也应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用性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又为进一步的理论创新提供了背景条件。为此,本系列丛书在实证分析中,也贯穿着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具体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① 胡伟清:《经济学运用数学的尺度》,载《经济学家》2006年第2期,第11~16页。

② 同①,第12页。

(1)坚持实证模型设计和案例选取具有针对性和典型性。这就是在实证分析的计量模型设计以及案例选取上坚持从理论分析出发,紧扣理论创新内容与数理分析得出的理论结论,而不能仅仅对经济数量的表面关系进行描述,为了实证而实证。

(2)坚持数据来源遵循客观科学的原则。实证分析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运用一定的方法对现实经济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从而论证理论结论,并用于指导实践,因此,数据来源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成为实证分析正确与否的关键因素。由于现实的情况总是比抽象理论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复杂,所以,本系列丛书中的实证分析就坚持以真实客观的现实数据为依据,而不能为了得到所需结论而选择性地遴选数据,甚至伪造和修改数据。

(3)坚持综合运用多种实证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不仅包括现代计量经济方法,还包括投入产出分析法,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经验数据分析等分析方法。鉴于现实经济的复杂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多样性,我们系列丛书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力求运用多种方法,同时也特别注意各种方法在研究中的适用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采用“拿来主义”。

序 言

严金强的博士论文《价值转形理论研究》，是在上海财经大学马艳教授和我的共同指导下完成的。选择转形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课题，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的，因为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著名难题，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有关这一问题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相关文献浩如烟海，并且需要坚实的数学基础作支撑。如何选择切入点，成为问题的关键。

严金强的博士3年级虽然是在日本度过的，但是关于他的论文指导，早在几年前马艳教授就同我交换过意见。特别是在总体思路，马艳教授提出可以考虑从广义动态转形的角度，将价值转形过程扩展至完成形态、垄断形态和国际垄断形态，从而使得价值转形理论研究得以完整。这是一个雄心勃勃并且非常令人鼓舞的想法。在我以前的研究中，曾经考虑过商业部门的加入以及农业不参加利润平均化的问题，但是并未涉及垄断，这将成为一个新的拓展。此外，马艳教授还提出，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动态转化会存在多种可能性，由此可以考虑构筑更加完美的动态转形模型。这也正是我在《百年难题的破解》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个希望，我当时曾经给出了一种简单模型，期望能够抛砖引玉，7年后，这个接力棒终于传到了严金强手里。

上述理论拓展和模型构筑成为严金强博士论文的主体思想。这些想法，在他的博士论文完成之前，已经反映在他与马艳教授合作的论文中，并被作为马艳教授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严金强也正是以上述思路为核心，在马艳教授和我的联合指导下，使其博士论文逐步成形的了。

说起马艳教授对严金强的指导，毕竟是网络时代了，即便是在

他留日期间,也未曾中断,MSN上留下了他们师生之间几乎每天都飞越日本海上空的宝贵谈话记录。

严金强非常勤奋。在我日本的研究室里,存有有关转形问题研究的大量文献,经过20多年的积累,特别是英文文献,从鲍特凯维兹1907年的论文开始,几乎没有什么遗漏。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前半年里,严金强披星戴月,将其中的主要部分几乎通读了一遍,使得他的博士论文拥有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本书是从理论上研究价值转形问题的一部力作。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我认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突出的创新性或特点。

第一,把资本流动过程导入了动态价值转形模型之中。转形问题的动态模型,此前已经有过不少的尝试,例如森岛通夫(1974)、置盐信雄(1977)等都作过这方面的努力,我的《百年难题的破解》(2004)中也曾给出了一个能够满足“总计一致二命题”的简单动态价值转形模型。不过,这些研究只是从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的动态形成过程来考虑的,并没有涉及其实现机制。我们知道,部门之间的竞争形成生产价格。这种竞争,并不仅仅是部门之间的销售竞争,也包括投资竞争,从而导入资本流动是题中应有之义。资本流动所带来的生产价格实现机制体现了部门之间利润率差异的影响。本书通过构建资本流动函数,模拟了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的动态形成机制,在转形问题研究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正如我所多次强调过的,经济模型的构建是否科学合理,并不在于数学使用的程度高低或数理推导的严密与否,最为重要的是模型是否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严金强的狭义动态转形模型做到了这一点:通过具体数值的实例演示,形象地描述了动态转形过程以及最后的转形结果,这也是本书的可贵之处。

第二,提出了价值转化形态的多样性理论。以往价值转形理论的研究主要讨论的是自由竞争条件下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没有涉及垄断等其他市场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自由竞争阶段只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历史阶段的一部分,垄断以及国际垄断等形式逐渐成为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本书认为,从长期趋势来看,价值转化形态逐渐经历生产价格、完

成形态的生产价格、垄断生产价格和国际垄断生产价格几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分别构建了各个阶段的生产价格理论模型，以说明各阶段价值转化形态的特征及其量的决定，从而使得价值转形问题的研究范围得到了新的拓展。

第三，捕捉到了产业结构演变与动态价值转形过程的内在联系。尽管我们早已知道，资本的内在逻辑或者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促使资本流动规律总是表现为资本从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但是并没有人能够把这一点与动态价值转形过程联系起来。本书通过动态价值转形理论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的演变，提出了利润率驱动型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并说明了为什么在产业之间存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资本流动规律会表现为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变迁，以及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本书并指出，当新产业的出现具有垄断性时，资本的流动规律又会表现为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转移。这种分析，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实应用，构成了一种新的开发。

当然，本书并非尽善尽美。例如，严金强所构建的动态价值转形模型，只能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满足“总计一致二命题”，在投入品以生产价格表示的一般情况下，“总计一致二命题”只能成立其中一个。这说明模型构筑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当然，应该不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碍（作为一种直觉，我感到只要对模型的约束条件予以完善，应该不难收敛到“总计一致二命题”）。我相信这也是严金强同学的下一个目标之所在。另外，在严金强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我曾经建议在资本流动函数的设定上，适当考虑一下“当量”（这里借用了一个化学名词）的问题，因为部门规模变动的最小资本量具有当量的意味，不可能是连续的，可以考虑通过导入一组当量参数来解决。还有，在本书中对垄断条件下的生产价格变动规律的研究没有具体展开，以及关于产业结构与价值转形理论之间关系的探讨也显得还不够充分。不过，这些问题并不影响本书的含金量，而是让我们想到，科学研究是没有尽头的。在科学探索的坎坷旅途中，我们可能会有幸留下某一个句号甚至一个里程碑，但

是在追求真理的漫长道路上,那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有人(不排除是自己)会超越它。希望风华正茂的严金强同学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研究转形问题,需要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素养,才能够真正深入进去。转形问题的研究成果,必须经过历史的检验,才能被人充分认识。否则,浮躁的所谓研究,恐怕会贻笑大方。例如,当年的森岛通夫,凭借着其数学优势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一知半解,尽管也曾一时被人炒得甚嚣尘上(甚至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但最终还不是被识者解破,终落笑柄,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严金强能够不辞辛劳、踏踏实实做学问,苦阅大量中外文献资料,并且不拘泥于前人的研究框架,勇于开拓,写出如此好书,在学风浮躁的今日,虽然难免被人看做像老学究一样的另类,但实属难能可贵。本书的出版,将加深我们对转形问题的认识,并将推动转形问题的研究,让我们看到那条继往开来的大道,越走越宽。

严金强同学是我和上海财经大学马艳教授联合指导的第2名博士研究生(第1名是目前在上海海事大学任教的张峰博士),早在今年6月,严金强已经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现在已经是严金强博士了。对于他能够将博士论文迅速扩展成书并与中方导师马艳教授联合出版,实在令我感到非常高兴,欣然挥笔写成此序。

张忠任

2011年12月于日本海之滨

目 录

丛书总序	1
序言	1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内容	7
第一章 转形问题的理论溯源:价值与生产价格理论	16
第一节 古典学派的价值与生产价格理论	17
第二节 马克思的价值与生产价格理论	25
第三节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与生产价格理论	33
第二章 马克思转形问题的相关论述和理论模型	44
第一节 马克思对价值转形问题的相关论述	45
第二节 马克思的价值转形理论模型	58
第三章 马克思之后价值转形问题的研究	71
第一节 转形问题研究的主要学派及其解法	72
第二节 狭义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	82
第三节 广义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	93
第四章 转形问题的理论分析与新假定条件	103
第一节 马克思的转形理论及百年之争的理论分析	104
第二节 静态价值转形模型的再考察	115
第三节 转形问题研究的动态化的新假定	126